**看完《藏晖室劄记》之后**

在学校书架上挑到这套三十年代的《藏晖室劄记》（《胡适留学日记》的初版名称），我的心情是激动的，于是当天就准备开始读。一旦开始读，何不每天写点心得感受呢，于是我开始在豆瓣写日记。一开始，我就有看完全部日记的想法，但是没有想到可以做到日更。每天看一点，任凭兴趣带我到何处，也任由胡适当时的想法牵引着，没想到最终有了九十三篇。从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开始，到二零年四月十一日结束，共计一百零四天，中间有几天耽搁了。

临近写完，我回想起了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最后一段。怎么走最后一段，我是有计划的，因为打算参加一早的朝圣者弥撒。我起了个大早，和同行许久的一家匈牙利人一起，摸黑带手电穿过森林，在半山腰的小店吃完早餐。走到一段旅途的末尾，尤其是长途跋涉的末尾，内心反倒是平静的，过往的劳累业已习惯，脚上也早已没有长出水泡，也不觉得背包有多重，一切都是自然进行的，走啊，走啊。走出清晨的雾气，从新城穿入旧镇，我发现我到了。没有马上坐下休息，没有回忆路上的一切，而是优哉游哉做了登记，就去了大教堂了。总之，一切都很自然。当我合上胡适的日记，心情也是如此。胡适的留美生涯结束了，学者生涯才刚开始，我的阅读告一段落，用另一种方式看胡适即将开始。

去年年末到今年四月初，是与国内新冠疫情重叠的巧合。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，是湖北下发《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》的日子。四月八日，离汉通道正式解封。身在国外的我，并不能切身体会武汉人经历了什么样的日子，他们到底有多恐惧，有多无助，有多少家庭破裂，又在政策下如何重拾信心。但看一些文章，觉得武汉人的性子和长沙有些相似，敢骂敢言，直直地活着。国内逐渐清零，国外势头渐炽。英国自疫情爆发以来，也更改了政策，医疗不堪重负，伦敦建起了方舱医院，伯明翰建起了太平间。一下子，我就身处疫情的中心了。不过英国做不到湖北的程度，伦敦也无法承受封城的代价。除了早期抢厕纸的疯狂，如今超市里虽有限购，但已经供应充足，各个社区也有志愿者在行动，街上出行的人还是少了些，我在小房间里过得很好。

那么，在疫情中读胡适是什么感受呢？胡适一直被人称赞的地方，一来是他盗西方之火，燃东方之炬，以开时代之先的精神，倡新文学、新道德和新学术，二来是他的自由主义精神，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。疫情导致了民意的分裂，国内如此，国际亦然。国内的抗疫方略被道德化，网格化管理和个人监管机制在特殊时期正当化；知识分子失声，讨论空间封闭，群氓闹哄哄；国家这个共同体被崇拜，一种追星的逻辑被嫁接到了所谓“爱国”之上，“民族”话语的分量增重，一切又在党同伐异之中贱得不值一文。国外的种族主义再次被唤醒；关于体制的争执让人怀疑是不是回到了冷战时代；阴谋论与个别政治人物互相奥援，尽管有一流的科研团队却无计可施。我们需要交流和借鉴的胸怀和勇气，要有对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坚守，要主张平和理性的言论和言论空间，要有对大疫之中、大集体之中小人物的关怀。我们需要胡适，甚至于超过了八十年代。

胡适的赞誉与诋毁几乎一样多，这诚是拜建国后批胡运动所赐，但也与胡适这位盗火者的身份和处境有关。先说胡适自身。胡适思维并不单一，他的思想内核绝非仅仅是西方的那一套，而是充满了东西文化的矛盾与共融（虽然我一贯不主张用“东”“西”来分别两种文化系统，但这里是最方便的表述）。胡适从传统的私塾教育中走出来，虽然历经了上海的中国公学时期，但骨子里的学问是文人式的，是有理学色彩的，是以诗文为中心的，是从考据和字本位出发的。起先留学康奈尔的日子里，他看剧本，写文言诗，作考证的文字，到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大学，只不过换成了写白话诗，作实验性的文字而已，兴趣还是一以贯之的。他是打算引入归纳的方法，加上实验的精神等，来规范旧体系，以期有新成果。他身上新旧两种道德体现在他的家庭观和女性观点上。作为一个亲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，他最终只得区分公私领域，留住私人生活和家庭领域中保守的一面，从而与自己达成和解。他主动承担家庭责任，为江冬秀感到愧疚，声称不再对另一半的智识抱有期待的同时，最终与韦莲司女士保持距离。当“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”，蒋中正的话评得不错，但胡适的苦闷又去哪里排遣？胡适的处境是多变的：一个剧变的中国。像胡适这样走中间路线的知识分子“活”了这么久，也委实不容易。胡适的路子是沉淀式的：经历了与梅光迪（或及任叔永）的白话文学辩论，胡适只想用一本实际的《尝试集》作出示范，尽管他的诗才实在平平；政治风波中劝大家先把自己铸造成器，应者寥寥；到后来，他做诸子，考《水经注》《红楼梦》等，都是在示范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。今之视昔，我们可以说他在激荡的时代中在守住书桌，也能说他是“爱惜羽毛”。这样的后果是，他没有像傅斯年和史语所诸人在新史学上筚路蓝缕，也没能作出毛泽东式鼓舞群众的革命文章，杰出的白话诗作也不多。他守着他的学法，守着他的“道”，不断地提点后学：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；认真的做事，严肃的做人”。直到后来，自由主义学者不见容，是时代的悲剧。

单拿出胡适日记中一些思想和行动，不少都是由讨论和借鉴的意义的。不论是他理学式的律己修身的态度（尤其见于前期日记），还是他用世界主义（或称大同主义）柔化民族主义（或称爱国主义），还是他主动观察美国社会的态度和举措，都值得当下的国人和留学生好好看看。不过，我认为，在这些零散的碎玉中，有一条值得关注的线索，即他对“一致性”（他本人用过英文consistency）的自觉追求。他强调为人要“一致”，言行和思想要“一贯/一致”，在外交层面上说，对本国与他国亦要“一致”。对“一致性”的自觉追求，是五四一代不少学人的治学阅世的态度，更是哲学层面的工夫，古希腊也有类似的想法的。如果放在现代性思想的框架下思考，追求“一致性”，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建构，用一套一以贯之的逻辑和理性，来有序地整理和规范认识对象，以期打造一个稳固而自洽的系统。这种“树状”的模式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一改为“块茎”（Rhizome）的模式。模式的改变随着对科学主义的怀疑而来，又随着对感性和非逻辑的重视而深入，最终反映到现实中，便是我们这个时代。不过，看一个学者的成长日记的好处在于，可以触摸他思维形成的轨迹。如何看他调适自己的思想，看到他所受的影响，这就有赖于对个人文本的多声部（Polyphony）特征进行分析了。我在此暂时没有探索阅读史的兴趣，也不指望能绘出一张观念史全景图，而只是想引胡适归国临行前的一句诗：“‘烟士披里纯’（inspiration），大半出吾友”。我们的知识，要么来自于他人，要么经历过他人的确认。知识的累进，灵感的迸发，就像神经元之间电流的跳跃。知道这一点，才有可能打破“理性-感性”的二元区分，才能试着把握“一致”与“不一致”之间的常态。

《胡适留学日记》（《藏晖室劄记》）是有局限的，胡适也是有局限的，但他对我的影响一定是长远的。自从爸爸初中时给我薄薄一本胡适的文选，我便有意找胡适的东西来读，泰半是文章、随笔和讲稿之类。后来有点长进了，开始看他人对他的记录和书写，最早是唐德刚，后来是欧阳哲生等，随后还有耿云志和其他学者。只可惜，我至今还没有读完江勇振的系列作品，也没有读完罗志田的书。尽管如此，我已经可以在我的言行和思维中甄别出来自胡适的部分了。胡适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也不是一个面面俱到的学者。我有很多方面也不是得了他的启发。胡适在治学领域上是保守的，是有士大夫精神的。即使他已经重视各种剧，但那也非他的主攻方向，也没有特别大的建树；即使他也参与政治，但在政治学方面也没有成就，甚至在任驻美大使时多次惹蒋介石不满；乃至他的治学方法，也要在当代有所调整，即使他的方法并未过时。《留学日记》是可以当一手资料看的，但同样要接受质问。胡适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留学是机缘，也是机遇。作为其时代的一份子，他并没有觉得日记就是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隐私，他是知道这部日记终究要发表的，而且会成为后人了解他的一种方式（见序言和部分日记的措辞即可知）。于是，他的日记是有选择的，到了后期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中心主题的。家庭的部分逐渐隐而不宣，感情生活也是。借王汎森的判断，“私人领域”的概念变化了。所以，光从《日记》来看胡适可以说是只得了基本盘，但却是不充分的。于是，我才说，对胡适的探索不能停，之后再看他人的作品而有心得了，可以继续往豆瓣日记上追加。

胡适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，但他期待中的时代尚未到来。如果说他是以中国的“文艺复兴”为追求，可能他的努力已经被半路腰斩；如果说他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追求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格来说并没有结束。看完他的留学日记，我不免也感叹，作为当代留学生的我，既无他朴学的基础，也无他盗火的能力，是在是惭愧。但我相信，治学是在前人肩膀上的工作，做人是长期的工夫，这一百余天，九十余篇，自然都会在我今后的生活中成为星星之火——“一历耳根，永为道种”。眼下疫情尚未退去，言论环境仍然堪忧，我们需要读胡适，我们的时代需要他。